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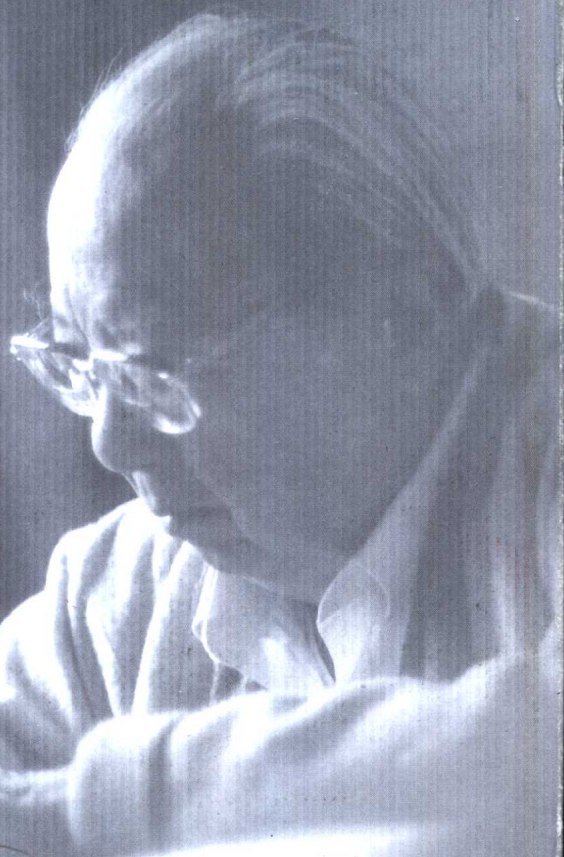
采访人 张冠生

世纪老人的话 费孝通

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本书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主 编 林 祥
采 访 人 张 冠 生

世纪老人 的话

费孝通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卷



B12747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老人的话: 费孝通卷 / 林祥主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6

ISBN 7-5382-6159-1

I. 世… II. 林… III. 费孝通-生平事迹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63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6.75 插页: 2

印数: 1 — 10 000 册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

责任校对: 马 慧

装帧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原 野

定价: 14.00 元

费孝通



老人似乎有权利对遥远的将来多做些梦。这倒不是因为能做梦的日子已不多，而是因为在梦后的世界里，还是有份的。今后现实世界的舞台上会出现什么剧种，多少会决定于他们梦中出现的景象。

费孝通

编委会

总 策 划 俞晓群 林 祥
主 编 林 祥
副 主 编 李文慧
编 委 金 涛 巫新华 李鸣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
责任校对 马 慧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装帧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原 野

策划人语

为何而做？人活着总要干点事情，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心中得意的事情。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受到震动……要保留、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活”资料，先出文字书，就叫《世纪老人的话》。

如何做的？先找到世纪老人，即被采访人。称得上“世纪老人”的并不多，由阅历、学识、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后选择采访人，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

做得如何？从策划到出书，磨了近三年，几经修改，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都力求做到一流。《世纪老人的话》有两大特点，简言之：一、直接交流、对话，客观性强；二、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史料价值高。

自觉做得努力，可得一个高分。最终打分人是读者。

目 录

策划人语 1

费孝通先生小传 1

访谈实录 7

访谈随想 7

学而不厌 海人不倦(张冠生) 152

众家评述 152

人类学工作的里程碑(马林诺斯基) 157

何等沉痛 何等正大(吴文藻) 160

未经『国定』的一种公民读本(潘光旦) 163

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林耀华) 165

晚年费孝通(谢泳) 167

乡土的精灵(李咏吟) 170

我心目中的费孝通(于孟达) 174

坎坷生涯平凡人 真诚心怀天下事(费宗惠 张荣华) 177

费孝通先生大事年表 182

后记 209

费孝通先生小传



费孝通、王同惠合影（1935）

费孝通（1910— ），江苏吴江人。父亲费玄楹，字璞安，曾公费留学日本。返国后提倡新学，热心教育，开办吴江县城第一所中学，并曾应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之邀，到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任教。母亲杨纫兰亦受良好教育，为清末民初女界先进之一，曾为我国最早阐发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著

《女界钟》作序，并在吴江创办第一所蒙养院。费孝通童年在这所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16年入吴江县的第一小学（俗名雷震殿小学）。1920年转入苏州振华女校。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高中毕业后升入东吴大学，就读医预科，想学成医生为人治病。后受革命思想影响，放弃医科，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入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1933年毕业于该系，获学士学位，并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攻读人类学。193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和公费留学资格，并于当年暑期结婚。蜜月中即与妻子王同惠一起赴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作田野调查。是年12月16日，他们在转移调查地点途中迷失道路，费孝通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于荒山暗夜中寻人援救，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遇救后，转广州治伤。其间根据瑶山调查所得资料，编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伤愈后，费孝通回家乡休养，在所住村庄进行社会调查。1936年夏携带这项调查资料赴英国留学，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读社会人类学。1938年完成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获博士学位。

1938年暑期，费孝通学成返国。时值日本侵华，我国沿海诸省皆已沦陷。费孝通绕道越南西贡登陆，到达云南，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并主持成立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开展

内地农村社会调查,采取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工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其间费孝通写出了《禄村农田》。

1943年,美国政府以盟国身份邀请中国各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前往,为期一年。访问期间,费孝通在芝加哥大学编译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研究成果,编译成 *Earthbound China* 一书;在哈佛大学编译成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一书,均在美国出版。

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益紧张。1945年,费孝通在潘光旦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同时,转入西南联大,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因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事件被迫离开云南,并于是年冬季重访英伦。1947年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解放。这段时间里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主要是整理讲稿,出版论著、译著。出版的论著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初访美国》、《重访英伦》、《内地农村》、《乡土重建》、《美国人的性格》、《皇权和绅权》、《民主·宪法·人权》等,译著有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斐斯的《人文类型》、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0年起,费孝通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率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1952年调至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云南作调查。这一

时期写作出版的著作有《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等。

1957年，费孝通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搜集整理有关地区的民族、地理等英文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1966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经历了十年浩劫中迫害知识分子的全过程。1972年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后，和吴文藻、谢冰心等一起翻译了海斯及穆恩著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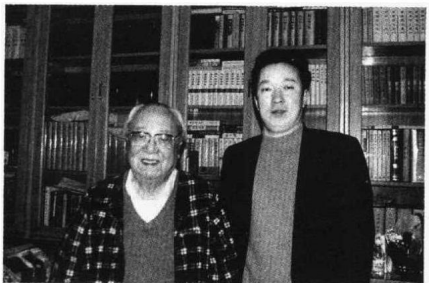
1978年，费孝通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是年多次参加有关民族工作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9月，参加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谈民族识别问题；11月，出席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发表题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的讲演；年底，参加庆祝宁夏和广西两个自治区的纪念活动，重访金秀瑶山。就在费孝通接续上50年代后期被迫中断的民族研究工作之时，1979年春，以邓小平有关“补课”的指示为依据而提出的“重建中国社会学”任务具体下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要求费孝通出面主持其事。费孝通为大局而暂时放下“自己去搞几项研究的设想”，受命主持社会学重建工作。为此，他于1979年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是年秋访问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同时，在国内开始为培训教员、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做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被任命为该所所长。此后几年里，费孝通陆续发表《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我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答〈中国青年报〉问》、《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问题》、《社会学问题解答》、《三访江村》、《小城镇，大问题》等文章，出版了《访美掠影》、《民族与社会》、《杂写甲集》、《重访英伦（及其他）》、《杂写乙集》等著作。

1985年，费孝通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他主张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应该是反映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华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入手。他在所里倡导实地调查的方法和风气，身体力行，把学术研究和培养后人结合在一起。从1983年到1998年，费孝通曾担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把这样的职位所能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发表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小商品大市场》、《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等力作，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小城镇四记》、《论小城镇及其他》、《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逝者如斯》、《芳草天涯》、《学

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1999年，14卷本的《费孝通文集》出版，集纳了他从早年到1999年6月间的绝大部分著述。

为表彰费孝通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12月，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1987年，获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称号；1988年，获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1989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称号；1993年8月，获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8月，获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奖；1998年12月，获霍英东杰出人物奖；1999年9月，获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别荣誉奖；2000年4月，获长江《读书》奖特别荣誉奖。



2001年 费孝通先生与本书策划人
林祥在费老家中书房合影

一、我是怎样进入中国问题研究的

张冠生（以下简称张）：费老，有位朋友策划了一个出版选题，叫“世纪老人的话”，分卷出版，一“老”一卷。目前已经出了十卷，有钟敬文卷、季羨林卷、张岱年卷、任继愈卷和严济慈卷等，每卷十来万字。这套书要求“以对话形式，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深入被访者的内心世界”。记得您前年建议沈昌文先生去找一些学界老人“赶快把东西留下来”的时候，也说过“要留灵魂里的东西，不是场面上的话”。这位朋友的想法和您的想法能接到一起，并认为不该缺少您的一卷，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帮助。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这个选题是在为文化的传递做事情，我应该支持，也乐于参与。最近几年我正在写“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下面的文章。文化自觉

的一个基本东西，就是要明白自己的文化特点，明白文化的特点是怎么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当中形成的。社会的发展，存在一个新陈代谢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能延续下来，是靠一代一代人的不断更替才完成的。对这种社会现象，我曾提出过一个说法，叫“社会继替”，写在解放前的一本书里边，书名叫《生育制度》。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不断换班。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后人接过前人的东西，保持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人虽然死了，社会没有死，文化没有死，就是这个道理。我讲文化自觉，就是希望后人不光接上前辈人留下的文化，而且要比我这一代人做得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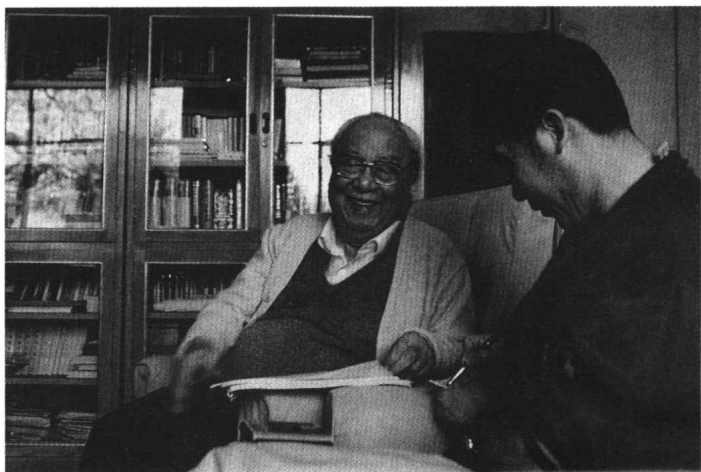
张：您已经九十岁了，大半辈子都在观察和体会中国社会的变化、国际社会的变化，经历了20世纪当中的许多大事，写下了很多文章，可以说阅历丰富，著述等身。如果是作传记式的访谈，恐怕篇幅要大大超出这本小书的文字容量。是不是就从您的学术生涯谈起，把人生历程带出来？

费：我可以讲讲我自己是怎样进入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的。我的话就从1930年的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那个时候我二十岁。我在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把研究对象定位在中国问题，又在中国问题这个大题目下先选定了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主要是由时代决定的。我出生于1910年，是辛亥革

命前一年，算是清朝的遗民。我的大哥还拖过辫子，我的头发长到够结辫子时，清朝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拖过辫子。拖着辫子的中国因为贫弱，受过列强的欺负，反抗无力，被叫做“东亚病夫”。我读完中学，进了东吴大学的医预科，当时是抱着想帮助人们去病强身的目的，学点医学知识。

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93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弯的年代，是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那是个革命的时代。我也跟着我的哥哥参加过革命活动。前些日子，我还想去找过去的老同学，谈谈我们年轻时的思想。都是九十岁的人了，应该还记得的。也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态。

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威胁。那个时候，年轻人懂得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实际上，当时差不多已经到了做亡国奴的程度了。那种情境你这个年龄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也不容易体会的。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心里很清楚，决不能当亡国奴。但是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各人就有各人的想法了。我当时是在东吴大学，那是教会学校。我上了两年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亡国的问题，是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个问题从30年代开始已经很具体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



回首前尘，俯察来路，费孝通说：“我的梦想是研究中国，懂得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采访人张冠生认真记录 1999）

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来救中国，避免亡国。为此不能说空话，要具体做事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事情呢？我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青年。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希望科学救国。我的想法，是用科学的方法了解中国的问题，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看能不能从这里边找到一条出路。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当时的时代给我们年轻人出的一道题，也包含着我们的向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了燕京大学，不念自然科学了。我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五四运动是讲科学救国的，要从科学道路上来了
10 解中国文化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碰到了